

史建平 主编
王胜春 副主编

求解

——经济改革问题研究

 海军出版社

求解——经济改革问题研究

史建平 主 编

王胜春 副主编

海洋出版社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解:经济改革问题研究/史建平主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4
ISBN 7-5027-6554-9

I. 求… II. 史… III. 经济改革-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930 号

策划编辑:申果元 林琳

责任编辑:庞从容

责任印刷: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375

字数:420千字 印数:1~1000册

定价:58.00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次

货币政策手段的差异分析	李宪铎 吕海蔚(1)
中国与俄罗斯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	石 伟(5)
关于大国经济的若干思考	王胜春(8)
论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于丁一(12)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提前清偿权的树型定价法	贺 强 李磊宁(17)
发展北京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汪明丽(22)
老年住房逆抵押贷款及其在北京的发展前景	汪明丽(25)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一次实践及仍面临的问题	王健宁(29)
企业集团财务管控模式初探	白 雪(32)
证券营业部经营成本降低的途径	许司南(35)
浅议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创新的构想	李美玉(38)
论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的推行	张 雪(42)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聂利君(45)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方学星(52)
海外战略投资者入股我国商业银行担忧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高退天(54)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胡传雨(57)
试论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	胡嘉嘉 徐 飞(63)
国内银行业理财业务的发展状况分析	黄 岚(67)
对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考核机制的思考	美国林(71)
浅谈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	刘新颖(76)
城市商业银行如何走出困境	李长富(79)
解读银行业的合规风险管理	李方然(82)
当前商业银行授信管理决策制度中的十大问题	孙屹申(85)
对我国商业银行授信决策组织机构的设想	孙屹申(89)
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对策研究	刘岩珍(92)
目前我国住房信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石竹青 胡嘉嘉(95)
论国内信用卡业务公司化经营模式转轨策略	司马甫(98)
银行卡业务再发展呼唤应用的拓展	美国林(101)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徐 飞 石竹青(105)
货币市场基金与理财业务的规范运营	袁 洋(108)
对中国商业银行营销的几点思考	刘新颖(111)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	张乃方(114)
浅谈银行业的个人理财业务	张 雪(117)
谈税收的流失——解读 2004 年纳税 500 强	李邦红(120)

加强地方税源建设 促进财政收入可持续发展	宋讲理(124)
浅析传统阴阳历法与股市顶(底)部的关系	李文辉(127)
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流通权价值计算方法及辨析	杨 瑞(130)
国内货币市场基金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石 伟(134)
基金发展前景分析	王冀川(137)
个人教育投资风险分析	何 冰(140)
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思路	姜 靖 张雅菲(143)
关于境外资源开发项目风险的思考及建议	姜 蕾(146)
构建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控制体系	李长富(149)
对冲基金的风险管理	唐 勇(151)
关联企业信贷风险的识别与防范	李方然(155)
防范风险须从源头抓起——新生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建议	刘岩珍(158)
代持企业股权的法律风险及解决建议	毛亚非(160)
防范信用卡风险 促进信用卡业务良性发展	司马甫(163)
透视国债热销	方学星(166)
关于当前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一些思考	付华杰(168)
浅析我国债券市场的金融创新	黄 岚(171)
关于7天回购利率浮息债定价的思考	张乃方(174)
关于“债转股”企业资不抵债时的账务处理	姜 靖 张雅菲(178)
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特点的初探	周文进(181)
浅议要约收购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付华杰(184)
浅析企业并购及其影响因素	富 翊(188)
公司并购影响因素分析和公司价值评估初探	刘伟杰(191)
探索新的金融监管模式 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	高遐天(195)
农村信用社改革应注重环境建设	李德峰(198)
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	田 滢(201)
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于丁一(205)
加强证券经纪业务的产品管理	许司南(208)
浅议美国存托凭证的发展	李美玉(210)
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问题研究	刘伟杰(213)
我国的金融体系应如何由分业转向混业经营	袁 洋(216)
为什么我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是当务之急	田 滢(219)
网上银行与金融创新	王冀川(222)
期货投资基金的现状与未来	唐 勇(225)
论我国政策性银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胡嘉嘉 石竹青(229)
浅议中资企业境外投资的问题与对策	陈 华(232)
关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建议	姜 蕾(237)
中国保险业在 WTO 后过渡期的机遇和挑战	毛亚非(240)

· II ·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构建	石竹青 徐 飞(244)
浅议中小企业融资难因素分析	宋讲理(247)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若干建议	陈 华(249)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中小商业银行发展	徐 飞 胡嘉嘉(251)
以多种方式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周文进(254)
浅析电子商务与企业税收筹划	富 翊(257)
中国高级中等教育经费来源与成本分析	何 冰(260)
国美的赢利模式	李邦红(263)
浅析《直销管理条例》对国内直销企业的影响	李文辉(266)
股权激励浅析	杨 瑞(269)

货币政策手段的差异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 李宪铎 吕海蔚

西方经济理论中,凯恩斯的《通论》奠定了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强调“国家通过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指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并相应引申出了以宏观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政策体系。由于市场需求是以货币作为载体的需求,是由货币所体现的有现实购买力的需求,所以它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控来进行,相应地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具有着重要地位。而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三大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因其各自的特点在实际运用中也有不同的效果。其中,公开市场业务在西方金融调控中广受货币当局的青睐。

一、公开市场业务适用于完备成熟的金融市场

一国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决定了不同的货币手段的有效实施,公开市场业务较之其他两种手段有着灵活、主动、连续性以及微调的优势,因而它适用于市场主导型的金融模式,而调整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这两种手段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发挥作用,较适用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模式。

对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模式而言,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的融资需求主要通过间接融资,即银行的贷款来满足。在该体系下,货币供应量由于能够满足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往往被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准备金率这种手段由于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银根的松紧,再贴现率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这两种手段的实施能够迅速达到有效的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并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同时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中,公开市场的规模小,影响力有限,所以一般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被货币当局采用。

对于发达的金融市场而言,企业的融资既可以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来满足,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增强了资金在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相应的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进而影响货币乘数,而且发达的资本市场往往会影响货币需求(据 Friedman(1988)、McCormac(1991)对美国和日本股票市场的实证分析显示,股价对货币需求有负向影响)和货币流通速度,这些因素使货币供应量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相对降低,资本市场的存在也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再贴现贷款的依赖程度,相应地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这两种手段都不能有效地实现货币当局的调控意图,而公开市场业务却恰好能弥补这些不足。西方国家近十年来由于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成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迅速发展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出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手段呈现了这样一个变化趋势: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越来越频

繁地被各国货币当局所采纳。金融调控的实践也验证了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与资本市场的互动性越来越显著。

二、公开市场业务的乘数效应机制扩大至资本市场

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并且这种乘数效应的发挥是通过收紧或放松银行的银根来实现的,但是公开市场业务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一部分是以银行体系来实现的,而另一部分货币供应的变动则是通过投资者的反复投资,具体表现为资本市场的乘数效应来实现的。所谓资本市场的乘数效应主要是指初始资本通过资本市场的派生而最终形成的放大的资本数量的过程,它主要变现为两方面:一为货币乘数的效应,一为财富的乘数效应。

(1)货币乘数的效应具体表现为资本市场内部金融工具的不断派生,例如:某机构投资者持有 10 亿国债,通过抵押贷款的形式向银行融资,在 90% 的抵押率条件下,该机构可以获得 9 亿资金,如果它继续在资本市场投资的话,又可以获得 9 亿的金融工具,经过不断的抵押及再投资,则该机构最终拥有的金融资产借助于商业银行的货币乘数效应将达到 100 亿,这 100 亿资产最终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表现出来。

(2)财富乘数效应则表现为资本市场的波动影响投资者财富总规模进而影响消费需求,最终引致对整个产业经济的需求。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一国的总消费、总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被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我国股票市场由于体制的原因,它的成长与经济常常会出现背道而驰的局面。从下表中可以看出,2000 年我国股市无论从市值还是指数都达到最高水平,当年股票市场总市值占当年 GDP 比重达到 53.75%。此后股票市场日渐萎缩,虽然 GDP 连年增长,股市市值占 GDP 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另一指标,伴随着 2000 年股市的最高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率达到最低水平,此后随着股市的不断萎缩,储蓄存款增加率却开始上涨。这些说明了股市繁荣时,居民倾向于股票投资,相应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当股市衰落时,居民更偏好银行存款,资金重新向银行系统积聚并由银行体系予以配置。这些说明了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

1997 - 2004 年我国 GDP、股本市值和城乡储蓄存款变化情况

年份	GDP(亿元)	全部股本市值 (亿元)	股本占 GDP 比重(%)	储蓄存款 (亿元)	储蓄存款增 长率(%)
1997	74462.6	17529	23.54	46279.8	20.14
1998	78345.2	19506	24.9	53407.5	15.4
1999	82067.5	26471	32.26	59621.8	11.64
2000	89468.1	48091	53.75	64332.4	7.9
2001	97314.8	43522	44.72	73762.4	14.66
2002	105172.3	38329	36.44	86910.65	17.83
2003	117390.2	42458	36.17	103617.7	19.22
2004	136875.9	37056	27.07	119555.4	15.3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5》数据整理。

其次,从居民微观角度来看,财富效应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人的毕生财富由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及金融财富组成,而金融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普通股。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会导致股价上升,金融财富价值增加,这样消费者的毕生财富也就增加了,消费会随之增加,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例如: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原始投入为50万,若能够获利10万,则盈利部分变现用于消费,则相应会对住房、汽车等消费品产生需求,这种需求又会引致对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的需求,这即是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对整个产业经济产生的系列影响。如股市上涨是短期的,对消费的影响可能较小;但如果股市繁荣是长期而稳定的,居民的金融财富持续增长,居民消费支出会明显增加。同时,股市的繁荣又可改变人们的预期,从而增加消费。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市场乘数效应是公开市场业务较之其他两种货币政策手段所独有的特点。正因如此,伴随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封闭状态的打破,公开市场政策工具的影响面日益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与力度逐渐增强,央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适时地买卖有价值证券,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商业银行的头寸,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水平,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了条件。

三、公开市场业务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层次更宽泛

由于各国在进行宏观调控时,经常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三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按照货币流动性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两个口径对货币供应量进行统计:货币和准货币。“货币”等于存款货币银行以外的通货加私人部门的活期存款之和,相当于各国通常采用的 M_1 ;“准货币”相当于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外币存款之和,它加上 M_1 相当于各国通常采用的 M_2 。关于我国货币量层次的划分,在1985年7月中国金融学会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会上,达成一致的划分意见,即:

$$M_0 = \text{现金}$$

$$M_1 = M_0 + \text{单位活期存款(企业活期存款 + 机关团体部队活期存款 + 农村存款 + 个人持有的信用卡存款)}$$

$$M_2 = M_1 + \text{城乡储蓄存款} + \text{单位定期存款} + \text{其他存款(即外币存款} + \text{信托类存款} + \text{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02年新增))}$$

$$M_3 = M_2 + \text{剩余全部银行存款(金融债券} + \text{商业票据} + \text{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一般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时通常以 M_2 层次的货币数量作为货币供应量的参照标准。这三种货币工具对不同货币层次的影响也不同,存款准备金及再贴现率主要影响的是 M_2 ,而公开市场业务主要影响的是 M_3 层次,这是源于前述的资本市场乘数效应,使得央行投放的债券可以通过抵押贷款的形式获取资金并形成对资本市场的再投资,因而货币形式表现为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工具类型,相应的这部分资产构成了货币供应的 M_3 层次。

但是,政府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货币供应 M_2 还是 M_3 层次的影响主要还是取决于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对货币和金融工具的需求程度,当投资者急需现金时,公开操作对 M_2 的影响多一些,相反对 M_3 的影响多一些。可是,机构投资者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的,这也就给货币当局控制 M_2 货币供应量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再加上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日趋松散,从而导致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断下降。正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 1993 年的国会听证会所说的那样,“美国货币政策原来的中介目标 M_2 已经失效, M_2 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消失了”。而造成这种联系消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离岸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创新模糊了不同层次货币的界限。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开市场业务较之另两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表现得更为全面,也更有利于货币当局掌控全局、顺利达到调控目的。

四、公开市场业务更加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是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这几个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因此各国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必须对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进行权衡。70 年代以前,货币政策追求的是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70 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滞胀并存的局面,驳斥了就业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通胀来提高的看法。此后,维护币值稳定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前提。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考虑到威胁经济增长的主要对象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故纷纷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即确定了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或目标区间,并予以告示,以提高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这种制度下,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资本市场所提供的融资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确定价格机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单靠币值稳定这一条件是不够的。无数次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整个金融的稳定,即便是币值保持了暂时的稳定,也会因为金融不稳定而引发严重的金融、经济乃至政治危机,无需太久的时间就可以将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经济成果和社会财富化为乌有。因此,货币政策现阶段的目标应考虑在保持整个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稳定不仅指间接融资市场的稳定,也应包括直接融资市场的稳定。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货币需求函数、货币流动速度、货币乘数等影响货币供求的变量均处于不稳定状态,货币供求已不再是一个由货币当局能够自如调节的经济变量,如 1997 和 1998 年,我国的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并不低,但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幅度却出现了双双回落。种种现实就要求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不仅应该考虑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增减,还应当考虑资本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而准备金率作为宏观调控的“一剂猛药”显然不太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再贴现率的有效实施取决于金融机构对央行的贷款需求,使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处于被动的局面,这些局限性限制了货币调控时这两种手段的运用,更多地将依靠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来稳定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

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金融变革,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凸现出来,资本市场货币乘数效应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用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当局金融调控的意图在现阶段也亟待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石 伟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分别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两国经济转轨的状态及其经验教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对两国转轨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下面将从五个方面来重点分析。

一、经济转轨模式的驱动机制分析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由原来的特权阶层操纵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首先,在初期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宪法秩序。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只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其宪法原则和结构是依据 1977 年苏联宪法确立的。1991 年底,苏联解体后,制定新宪法这一任务就显得异常迫切。其次,在经济转轨中,政府主体在博弈中并不处于优势地位,也不足以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博弈中处于优势和决定制度供给的是特权阶层。例如:别列左夫斯基就有“克里姆林宫教父”的美称。因此,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实际上是寡头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再次,俄罗斯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带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20 世纪 90 年代所进行的转轨本质上就是要把原有的社会主义改造成资本主义。所以,与中国的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不同,俄罗斯的寡头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造成的社会摩擦大,寡头操纵的政府主体对制度创新的安排与公众为代表的非政府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具有很大的不一致性。

二、经济转轨模式的目标分析

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和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是从过去公有制的单一经济形态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俄罗斯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的经济改革摒弃了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计划型按劳分配的模式,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形态向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共同参与分配的经济形态转变。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确保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积极地消灭贫困现象,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和结果来对待。而俄罗斯生产要素的全面私有化,意味着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侧重于资本这一要素。俄罗斯的主流经济理论强调:按劳分配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是冲突的,而西方经济学

所主张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正确的;为了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率,模仿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尽快形成一个掌握大量资本的所有者阶层和经营者阶层;至于在私有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公平现象,是迅速推行市场化的代价,以按资分配为特征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状态难以避免。

三、经济转轨模式的方式分析

中俄经济转轨的主线可以概括为产权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各种目标和措施,实际上是通过产权和市场两条主要途径来实现的。

1. 所有制的演变

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城市和农村逐步推行广泛而深刻的产权制度变革。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完成了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城市集体企业也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制和股份合作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完成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利改税、股份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个体经济渐渐恢复和壮大,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外资经济稳步成长,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逐渐成长壮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包括基本制度的转换,就是要把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就是实行私有化,即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在俄罗斯建立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运作的自由市场经济。围绕着这一目的,私有化本身就被视为经济转轨的核心和目标。

2. 市场制度的演进

中国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显示出若干阶段:1984年以前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制定计划时要积极运用价值规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转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80年代末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积极建立市场体系,国家以间接调控为主;1992年以来,迅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体系及其调控体系已初步形成,并进入逐步完善阶段。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也有一个变化过程:1990年2月苏共中央提出了“计划-市场经济”模式;4月又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9月正式宣布“向市场经济过渡”,取消了“可调节的”这个定语;1991年10月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批准了叶利钦的经济改革原则,其中包括“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实行私有化和实现宏观财政稳定。在此期间,中俄两国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还进行了包括价格制度、金融制度、对外经济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四、经济转轨模式的选择机制分析

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与推广、局部与整体、增量与存量、体制内与体制外、自上与自下、强制与诱导、激进与渐进等多方面相结合的过程,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启动、迅速展开和互相呼应的。尽管改革的步骤、措施与速度有起伏变化,但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基于中俄两国改革的目标和定位不同,以及

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上的差异,经济改革的轨迹和路径既有相似的一面,如所有制结构均为多元化和混合型、价格均放开、本国货币均实行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等等,又有重大区别。在改革的速度上,中国是以渐进为主的,而俄罗斯是以激进为主的;在改革的步骤上,中国是局部试点和步步推进的,而俄罗斯是“一步到位”后再慢慢纠错的;在改革的顺序上,中国是以先立后破为主的,而俄罗斯是以先破后立为主的;在改革的方式上,中国是强制与诱导并用的,而俄罗斯是强制和命令式的。

五、经济转轨的绩效分析

中国在有序地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虽然其中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总体来看经济改革的收益明显超过成本。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2000年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4%;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通货膨胀率除了少数年份以外,多数年份在1位数之内。

(2)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与1978年相比,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由28%下降为18%,第二产业由48.6%微升到50%,第三产业由23%提高为35%;城市化、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从短缺经济走进了轻度的买方市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和旅游等部门发展迅猛;知识化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大;国民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引进外资和外汇储备均排名世界第二。

(3)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已经超过12万亿元;1978—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4%,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明显提高。

但是俄罗斯经济转轨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经济转轨的成本大大超过收益。

(1)国民经济长期负增长。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和中国的1/5,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均GDP减少到了1500美元,只有“七国集团”平均指标的1/5。

(2)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伴随着进一步放开价格和大量的财政赤字,俄罗斯持续发生“奔腾式”或高位通货膨胀。1992—1996年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2680、1008、312、231和121.8。

(3)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俄罗斯改革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官方承认,1991—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例如,1992年1月至1995年9月平均工资增长了392倍,平均退休金增长了448倍,而物价却上升了1608倍。

(4)综合国力明显下降。根据格列夫战略研究中心比较乐观的预测,按每年递增5%的速度,到2010年俄罗斯GDP将增加到4570亿美元,但也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是中国2000年的一半,而中国届时将达到20000亿美元。

综上所述,中国和俄罗斯虽然都处于转轨时期,但由于两国沿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进行改革,从而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通过进行两种模式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并为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关于大国经济的若干思考

中央财经大学 王胜春

一、何谓大国

有关大国的定义,目前无论是在经济学上还是在政治学上,都没有被学者或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的定义。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大国大概会从几个角度去定义。比如从国土面积,像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中国、巴西、阿根廷、印度都可以说是领土大国;还有就是从人口,像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等都是人口大国了;还有从经济总量,像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就又是经济大国了。很显然,按上述不同的标准会划出不同的大国群,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同特点和问题。

但不论按什么标准划分,中国都可以在上述的大国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领土排第四,人口排第一,经济总量排第七(2004年,世界银行统计)。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或者说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呢?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难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口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5933.6亿美元,进口从108.9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5613.8亿美元,分别增长了60.86倍和51.55倍,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70%。由于我国外贸长期对美日等国保持顺差,所以遭遇来自这些国家的强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太高,在中国GDP构成中,净出口占比太高,不利于国家安全,应该适当降低进出口额。海外的一部分学者也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为优势,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改进其他国家国民的经济福利,应该适度控制出口增长的速度,控制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外贸依存度应该维持在多少上比较合适,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如果按上述学者提出的建议,控制进出口的增长,尤其是控制出口的增长,就会使中国面临第二个难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现在外贸出口部门安排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因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以这些企业为就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在重庆等地外货部门安排的农村劳动力达到转移人口的70%以上。如果控制出口的增长,就会使中国的就业问题凸现出来。我国目前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再就业人员14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1.5亿,就业压力为全球首位。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靠内需。但自从1990年开始学界提出启动内需的观

点到目前,一直是启而不动。为什么中国的内需难以启动,这又涉及中国经济的第三个难题:需求结构。

简单地说,需求结构就是不同的需求主体各自的需求在总需求中占的比重。其中有内外需结构,需求的地区结构,需求的城乡结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结构,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结构,政府需求与居民消费结构等问题。如果单是从地区结构或是城乡结构分析,我们可以把它按消费能力抽象为富人(富裕地区)的需求与穷人(贫困地区)的需求问题。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一国经济运行中的总需求公式如下式所示:

$$TD = (a_1 + b_1 r \cdot Y) + [a_2 + b_2(1 - r) \times Y]$$

其中 a_1 、 a_2 为不同消费群体的自发消费, b_1 、 b_2 为边际消费倾向, r 为在总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其取值范围在 $[0, 1]$ 之间, Y 为可供分配的社会总收入, 1 代表低收入阶层, 2 代表高收入阶层。

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收入高的地区或人群其边际消费倾向低于收入低的人群和地区,所以 $b_1 > b_2$ 。

上式经合并整理后为: $TD = a_1 + a_2 + b_2 \times Y + (b_1 - b_2) \times r \times Y$

此时,如果 TD 求最大值, $r=1$ 时, TD 最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将会带来更大的需求。因为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所以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就比较高。从社会生产资金供给角度看,他们是社会生产主要的资金供给者,如果上述公式中的 r 等于 1,全社会的边际储蓄倾向将有可能下降,使社会生产资金的供给出现问题。那么 r 等于多少合适呢? 这又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转化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中国应该如何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问题,这中间又涉及力度、手段、速度等问题。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各地在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有的地方需要解决的是劳动力的输出问题,有的则面对如何能够输入劳动力。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有些地方属于景气指数领先型的企业比较多,每次经济启动都会给当地带来好处;而有的地方属于景气指数滞后型的产业比较多,当地经济还没有热起来,就遭到宏观调控,以至于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这就使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第四个问题:宏观调控是否需要考虑地区差异。从宏观调控可以使用的工具上看,在中国主要有四大工具:财政手段、货币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其中,货币手段由于调控的是货币供应量,货币因为有完全的同质性和完全的流动性,一旦紧缩或是放松,都不可能是局部政策,而一定是全局政策;法律手段因为中国各地区没有足够的立法权,在调控效果上也难以有地区性差异,而财政政策的时滞比较明显,灵活性不强;只有行政手段能够体现足够的地区差异,但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宏观调控,又与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不一致。

另外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要想启动一个物理质量很大的物体,通常情况下很困难,因为前期需要投入较大的力量。但一旦启动了,要停下来也很困难,因为它有较大的惯性。同样如果经济的启动和降温都偏向于使用行政手段时,经济就容易出现大起大落,急涨急跌,增大经济波动的幅度,破坏经济运行的正常基础,增加调控的成本。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如何合理运用上述四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改进调控

的效果,减少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并且逐步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而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是需要解决的第五个难题。

与上述难题相关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第六个难题是中国经济结构,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的构成问题。目前有不少学者提出应该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配合,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中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竞争力、高资源消耗的产业太多,这种产业结构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非常不利,不符合我们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不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但这样的一个调整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我国还有约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这些劳动力大都只受到初等教育,想让他们进行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产业就业是不可能,如果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对他们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知识水平,改善产业结构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个问题对于目前已经在所谓的“三低一高”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来讲同样存在。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合理的,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又不至于引起财政过重的负担和社会动荡是中国目前需要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三、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反思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最近二十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界和政界非常有市场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如果对新自由经济学进行简单的归纳,其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核心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提供的分析来讲,应该说他们提供了一整套完善的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经济模型。根据这些模型,供求关系、完全竞争、自由贸易、产权明晰、自主定价就可以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实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效率。然而事实却很残酷,一方面是原来的市场经济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不断增强,政府支出从1959年的1100亿美元,1970年的2338亿美元,1990年的1180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1838亿美元。真正的完全竞争市场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原来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的国家,如拉美各国,近几年经济、政治问题层出不穷。各国已经在最近的十年里,都建立了由左翼政党组阁的新政府,改变了过去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在我国,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虽然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贫富分化、地区差距、城乡差别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包括生产安全、卫生安全、社会治安在内的公共安全问题也连续出现问题。

从目前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供求论、成本论、均衡论、竞争论、博弈论等内容,也可以看到 $Y = C + I + G + NX$, $NX = NCO$ 等公式,以及IS, LM, BP等曲线,了解到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在开放条件下的同时均衡。但从总体上说,这些模型都是理想化的,而且它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关注不够,也没有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给予足够的关注。像前文中论及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六大难题,都是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以解决的。

在国际经济学有关关税的讨论中,经济学界区分大国、小国有一个标准:小国是在国际经贸中无法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的国家,而大国则是可以对价格的形成产生影响的国家。毫无疑问,这种划分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总

量虽然已经排在全球第七,但进出口额在全球贸易中占比并不高,想在国际贸易中拥有定价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于中国来说,更多、更重要的是有关中国国内经济中的问题。无论从劳动生产率、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看,中国还要继续努力,才有可能接近先进国家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平问题也已经到了必须给予关注的地步。对外依存度、劳动力转移或者说就业、需求结构、地区差距、宏观调控的手段运用、产业结构合理等问题只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但借助于一个怎样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可帮我们廓清现实的迷雾,走向真理的彼岸呢?

我们呼唤属于中国的大国经济学!